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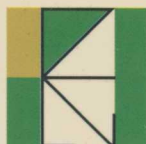
珍素齋藏印

馬承源





0146487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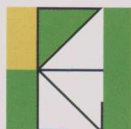
民政總署
INSTITUTO PARA OS
ASSUNTOS CÍVICOS
E MUNICIPAIS



ISBN 99937-54-73-0



9 789993 754732



民 政 總 署
INSTITUTO PARA OS
ASSUNTOS CÍVICOS
E MUNICIPAIS

民 政 總 署 文 化 康 體 部

澳門南灣大馬路517號南通商業大廈十九樓

Tel:(853)9884000

Fa x :(853)322127

網頁Web-site

<http://www.ia cm.gov.mo>

<http://www.cityguide.gov.mo>

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製作。
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。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出版。

ISBN99937-54-73-0

珍素齋藏印

馬承源



製作人員表



總監

馬錦強

藝術指導

余永鴻

林偉業

目錄編輯/校對

蕭春源

設計/排版

林偉業

攝影

Fotografia/Photography

尹清儀

分色/印刷

鴻興印刷有限公司

發行數量

500本



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製作。
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。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出版。

ISBN99937-54-73-0



漢魏晉唐宋八篇



《珍秦齋藏印—漢魏晉唐宋元篇》

綜述

漢代印章包括西漢、東漢，是印章史上發展最為顛峰、鼎盛期，與社會穩定、經濟發展迅速，工商應用頻繁息息相關，不僅數量繁多、形式多樣化，更是文字風格多變、力求美化、內容豐富，構成博大、渾厚、沉實的風貌，加上鈕制繽紛，鑄造工藝精緻，遺留及展示了其輝煌史跡和智慧，誠為後世收藏家、篆刻家所鍾情和學習典範，亦因而滋潤和孕育了許多篆刻家成為明、清、近代時期一代宗師。南北朝的印章風格粗獷、奔放、粗頭亂服，則成為現代篆刻者追求突變的風氣。唐、五代、宋官私印是後世圓朱文印章的啟蒙和隸、楷書入印所借鑒。

漢代官印的歷史、用印制度、文字特點變化和分期，已經有許多學者專家在羅福頤先生《古璽印概論》基礎上撰文，例如葉其峰先生《西漢官印叢考》⁽¹⁾，王人聰先生《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》⁽²⁾和孫慰祖先生的《西漢官印、封泥分期考述》⁽³⁾和《漢印論》⁽⁴⁾等，故不再贅述。

本篇所收是漢、新莽、魏晉南北朝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官私印298方。質地有銀、玉、銅、鐵、琉璃、鉛、瓷等，印鈕有鼻鈕、瓦鈕、橋鈕、覆斗鈕、龜鈕、螭虎鈕、熊鈕、獸鈕、馬鈕、兔鈕、駝鈕、蛙鈕等各種式樣。分官印、私印、穿帶印、吉語箴言印、帶鉤及肖形印五部份。

這些藏品分別反映了該時期不同時代的印章的面貌和特點，多未曾著錄，對古史、官制、用印制度等研究有重要價值及補史載之不足。今擇其要者略述之：

如第17頁“建平君印”乃封君印，秦漢時期封君印著錄及存世不多，僅見上海博物館“廣平君印”、“長安君”，故宮博物院“昌武君印”，揚州市博物館“武信君印”，天津藝術博物館“武平君璽”等，發掘品有山西出土秦漢之際楚漢相爭時期的“安國君”，及1989年徐州出土之“君侯之印”，著錄可靠者有《尊古齋金石集拓》之“樂平君印”和“增武君”。“建平君印”伴出有“周昌”銅印。此印考釋以上海博物館孫慰祖先生在其《孫慰祖論印文稿》，《新發現的秦漢官印、封泥資料彙釋》⁽⁵⁾中考証至確，指出此印印鈕有戰國遺意，印文風格乃秦漢之際交替，又根據文



獻，結合1989年徐州出土之“君侯之印”等論証此印為漢初建平侯周昌之印。況且同出“周昌”印，白文日字格，字體不像秦那種圓轉柔勁、隨意風格，具漢初印章特徵，亦與史籍記載印主封君時代吻合，實為珍貴封君印。

第19頁“白土牢監”印文刻鑿而成，牢監印著錄較少。只見《古封泥集成》⁽⁶⁾有“後部牢丞”。白土縣西漢屬上郡，故城在今陝西神木縣西面香尾河中游。牢監官是掌管牢獄的官吏。

魏晉南北朝璽印斷代分期最為複雜，一般對該時代印章籠統稱之三國、南北朝或魏晉、南北朝。最早給予後世鑒別指引的是羅福頤先生編著的《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》，影響至今。而最為承前啟後有突破性研究的，首推孫慰祖先生的《西晉官印考述》⁽⁷⁾，圖文並茂，分析細膩，可作為鑒定這一時期官印的重要標尺。

第24頁“廣武將軍章”同文著錄及存世約十數鈕，皆銅質，龜鈕，鑒金者有一，鑒銀者未見，僅此品。龜形較圓渾，背隆，中及兩側脊棱以小圓圈為界，昂首，頸下有突出龜板，具西晉龜形特點，印文又偏離西晉，應是東晉承西晉脈絡之物。

第25頁“將兵都尉”銀質、獸鈕，同文《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》著錄約四枚，皆龜鈕。獸鈕者絕少，多見於南北朝。除印鈕鑒識外，結合文字特點，應屬十六國。

王人聰先生有《部曲將與部曲督印考》文⁽⁸⁾將歷來印譜所著錄和近年考古發掘品數量一一列舉，並附印文。筆者現統計部曲督印約50餘方，部曲將印連中文大學新入藏的9方共約180方。據考証部曲將與部曲督始置於東漢末三國時期，延至兩晉仍有設置，其印文篆體風格一致，皆鼻鈕，鈕面較窄，鈕壁較厚，鈕孔小。

本篇第25頁所收“部曲督印”則非鼻鈕，乃駝鈕。筆者據現有搜集資料顯示，故宮博物院有2枚，上海博物館1枚，日本鳴雄綠齋1枚，常熟博物館1枚，安徽省博物館1枚；“部曲將印”日本太田夢齋1枚，香港中文大學1枚，湖南省博物館1枚，西泠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藏1枚；“副部曲將”故宮博物院1枚。數量遠較鼻鈕為少。兩類印雖同印文，但細審有許多差異之處，值得探究。(一)駝鈕“部曲督印”其“督”字上“又”中間筆較直，(二)駝鈕“部曲將印”、“副部曲將”“將”字右傍作“𠂔”不像鼻鈕作“𠂔”，(三)駝鈕印文挺勁峻厲，刀痕明顯，形態與趙“親趙侯印”、“歸趙侯印”馬鈕接近，髹毛紋飾刻鑿清晰細緻，筆劃柔勁，佈局開朗不草率，兩者



風格一致，據此，這種駝鈕印應屬趙官印，亦是這時代印鈕藝術最佳作品。

第23頁“通道侯印”銅質，鑲金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「屬北地郡，除道，莽曰通道。」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》：「通道縣，南朝宋舞陽縣地。」應是南朝印。然此印有異於該時期印鈕，是另一別調也。

北朝官印，印面一般較大，印台厚，龜形碩大，如第27頁“安陸太守章”龜作拱站立狀，背分為六片甲狀，邊錯銀，極顯尊貴，印文筆畫隨意，脫離小篆勻稱結構草篆刻鑿而成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「安陸，屬江夏郡。」宋、齊、梁均置為郡，然此印印風不類南朝，類北朝“廣寧太守章”《徵存2358》。這時期官印形制在北周却起了很大變化，如1982年陝西漢陰澗出土的“衛國公印”銅質、鼻鈕，印面邊長5.5厘米，朱文篆書；1996年陝西又出土北周“天元皇太后璽”朱文，獬豸鈕、金印，印面4.45厘米見方。由此，北周官印由北朝的白文演變為鑄朱文，印面尺寸增大，此體系從此轉入隋唐印制的變革和承接。

踏入隋唐、五代由出土實物得知封泥在此時期僅用來封檢當時各道、州、府地方官進貢皇帝的酒壇、蜂蜜壇和蒜等物品外，封泥的使用基本消失。由於文書普及使用紙張，書寫自如，不為簡牘大小局限，印章大小亦沒有障礙，官印承北周，鈕制變鼻鈕、橢鈕，更實行由職官印改為官署印制度，如此官印則不再適宜佩帶，改為專人掌管，更用專盒封裝，採取“牌入印出，印入牌出”，嚴密完善用印制度。

隋唐官印存世數量稀少約40餘方，實物更難見，故對其鈕式、印制、文字等認識不足，不為藏家注意。最有真知灼見的是羅振玉，其編著的《隋唐以來官印集存》給予後世對這方面的重視。近年有羅慕鴻先生《談隋唐官印鑒別》⁽⁹⁾，繼而是周其忠先生《唐代官印初探》⁽¹⁰⁾，王人聰先生《近三十年來唐官印的發現與研究》⁽¹¹⁾，最近則以孫慰祖先生《隋唐官印體制的形成及其主要表現》⁽¹²⁾最為詳盡透徹分析，給予我們對這時期官印的認識、鑒別、收藏莫大幫助，更是給予隋唐官印歷史地位的價值肯定。對唐代某些特殊官印如“契丹節度使印”的年代，最近葉其峰先生又撰文提出了新觀點，認為此印應是僅見的契丹國漢文官印⁽¹³⁾。

第27頁“烏弋道大軍之印”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》：「烏弋州，唐置羈縻州。今闕。當在新疆境。」此印銅質，鼻鈕，印文深0.7厘米，筆畫交接處有焊接痕，此印文書法風格與上海博物館藏之“殿中省行從之印”類同，是難得的唐印標準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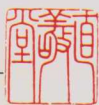


隋唐私印稀少罕有，羅福頤先生在編著其《古璽印概論》、《古璽印考略》時，因未有發掘品出土，甚至因某種因素遲公佈資料，致使羅先生認為未見有傳世品，僅取敦煌石室藏唐經上所鈐“報恩寺藏經印”及唐寫本法華經玄贊上蓋朱印“瓜沙州大經印”作為唐私印標準品。早在1973年洛陽老城北鐵路醫院M1墓已出土了一方唐私印“武威習御圖書”，該印遲至1993年才公佈⁽¹⁴⁾。1984年河南偃師杏園村唐李存墓又出土了“渤海圖書”印，兩印皆銅質，有印匣，兩者的形制和鑄造工藝、甚至連印匣亦與官印相若，使我們對傳世唐私印的鑑定有了依據和提供了一個準確標尺。

最近孫慰祖先生在其研究成果論著《唐宋元私印押記集存》上，利用唐人使用私印遺迹再結合出土官私印、墓誌、碑刻實物及依其鑄造工藝、書法特點而將一些猶疑未決的印章歸入唐代。有上海博物館的“洞山墨君”、“李忠之印”、“岡廬典籍之印”、“上明圖書”、“伯溫圖書”，漢和堂陸氏之“始封于鄮”及本篇第135頁“敦實”。為唐宋私印研究史開創了新的課題。

五代十國官私印比唐印更稀有，確切發掘品有前蜀王建墓出土的“高祖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謚寶”，此印白玉刻成，謚寶乃仿在生時所用璽而來，《後漢書·禮儀志六》：「諸侯王、列侯、始封貴人、公主薨，皆令贈印璽，玉押銀鏤……」所言贈印璽，為殉葬用者，故與“玉押銀鏤”並舉，其上所刻當為所贈之謚號。此印雖是刻鑿而成，但文字結構，印文風格均按五代時期所制，故對我們鑒識五代官印，有了實物依據。除此，羅福頤先生將天津歷史博物館藏“元從都押衙記”定為梁印，是根據《舊五代史·劉鄩傳》：「天復三年十一月，劉鄩以兗州降梁，及見梁太祖，慰撫移時，令賜冠帶，旋授元從都押衙。」而定。

此時官印印文不局限篆書單一模式，並出現了隸書和楷書。鼻鈕分有孔、無孔兩種，其中印鈕有呈半圓及平頂削去兩棱者，鼻鈕有小片狀者。印面由方形轉長方形，由厚轉薄，印文不深。由於遺存實物稀少，這時期官印與唐代朱記官印很難分辨，易出現偏差。故此，只能以目前遺留的實物、史料、文字風格來判定，第29頁“立馬第四都記”均具備以上特點，準是五代印無疑。此印與銅質印匣出土，印盒長方形，器形上小下大成矩形狀，蓋略作盞頂，四側鏤空作山形，蓋底以子母口扣合，上有鎖環及原裝鎖。器蓋、身兩側各有長形穿帶鈕一對，內殘存皮革，匣座除四側各有鏤空心形外，兩側亦有長形鏤空，以便革帶穿連提攜作用。匣內有長方形印合，盛放官印之用，可貴之處尚殘存紅色印泥物，由此可証這種印匣兼作印台之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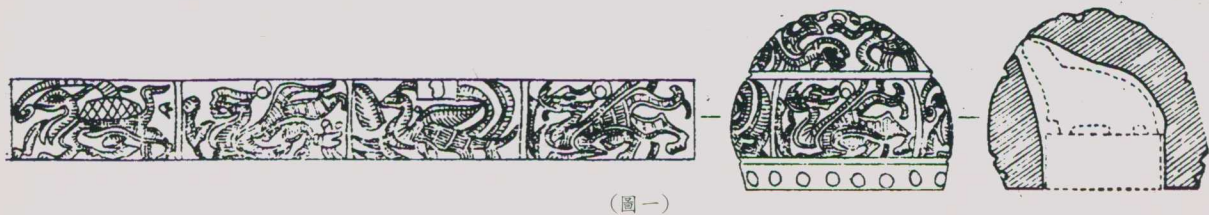


印匣使用雛形最早見於戰國和秦代私印⁽¹⁶⁾。官印實物最早見於1985年青海西寧市北朝墓出土“凌江將軍章”印，銅質、印匣角質，近似一半圓球形，周腹刻有龍、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圓形。下部一周穿有17個未穿透的孔，原鑲綠松石。印匣腹內按銅印的形狀雕空，以盛印章，極盡華麗，這表明非官方規範所造，乃該將軍自制(圖一)。私印印匣除上述唐“渤海圖書”及“武威習御圖書”外，1993年揚州儀征化纖白紗二村出土一北宋石刻印盒及銅印2枚。印盒分三層，外週邊有浮雕蓮紋，層層子母扣相合，可單獨開啟，第二層內開一長方形穿孔，放置兩枚印章，朱文，直柄鈕，分別為“高陽許食私印”和“許”字，長方形穿孔邊欄墨書“明道二祀歲次癸酉上春于□□□高陽”題記⁽¹⁷⁾，即公元1033年北宋明道二年所制。

官署印匣出土現存實物有三方，即浙江紹興出土的“會稽縣印”⁽¹⁸⁾、安吉“金山縣印”⁽¹⁹⁾和廣西隆安縣出土的“武夷縣之印”⁽²⁰⁾均唐代。隋代未見實物，傳聞1993年陝西咸陽市北郊唐順陵附近韓家村出土的“右武衛右十八車騎印”附有盞頂蓋金屬印盒，盒上有刻云紋飾，惜已毀壞⁽²¹⁾。本篇“立馬弟四都記”印配有原裝鎖封匣，這証明宋趙昇《朝野類要·職任·牌印》：「用印畢，封匣，復納之。」屬實。此印是目前最完整，印匣最大，最有史料價值、藝術價值的文物。

五代私印甚稀，第134頁“實封朱記”，長條形鈕殘，印文深0.7厘米，孫慰祖先生在《唐宋元私印押記集存》將其歸入唐—五代範疇，今以印文結構特點及形制看應屬五代。除此，今夏路過上海博物館參觀歷代璽印館時，見陳列有五代“安書”印，印面頗大，字體疏朗自然，為我們提供了五代私印標準參考品。

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承前啟後的一大轉變重要時期，不論科技、造紙、紡織、制瓷、文化、金石學等均超越前代。故印章存世很多，而此期制印初期除承襲唐五代“條帶印”外，皆鑄文，北宋時官印背款加刻監造機構，實行印牌制度比唐代更為嚴緊。中期後印文多趨向平實整齊，私印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瓷印和石印。



第135頁“龍”印，依殘存鈕座看似屬鼻鈕，印背四沿成圓弧形，屬較早期印台式樣，結合印文書法和瓷胎判斷，應屬北宋。第138頁“沙隨程迥”龜鈕，龜背刀痕明顯，印文隸楷間，如刻碑法而成。印體碩大，根據印台四邊釉色鑑別，屬南宋景德鎮瓷制，印主程迥得吉林大學吳振武教授考釋屬南宋隆興年間人(詳見附錄)，則形制與印主年代吻合。此印制作精美、釉色完整，堪可作為這時期瓷印斷代的標準品，孫慰祖先生又云：「鈕體居中而未盡佔印台，為鑒別宋元明鈕式提供了重要參考標準。」

第139頁“佛法僧寶”與上海博物館所藏“柯山野叟”均屬南宋，字體採用九疊篆，筆畫挺勁平實，各有特色，是不可多得珍品。

遼王朝乃由契丹族建立，故有一國兩號，實行“因俗而治”的政策，設置北面官和南面官兩種官制，因而官制上出現了漢文官印和契丹文官印。漢文官印傳世不多，除傳世品故宮博物院收藏的“安州綾錦院記”外，《遼海印信圖錄》多有著錄⁽²²⁾。契丹文官印據劉鳳翥先生統計，總共不過100枚，多為契丹大字官印，印文真正能全文釋讀的乃故宮博物院藏“元帥左都監印”而已⁽²³⁾。本篇第33頁亦為契丹大字官印。

西夏由党項族李元昊所建(1038-1227年)定都今銀川，其政治體制，官吏制度多仿效宋代，文字亦是仿照漢字而創制的一種特有文字。清代進士張澍于嘉慶九年(公元1804年)開啟了被砌封於甘肅武威清應寺(即護國寺)感通塔碑，見碑文字體方正，類似漢字，然一字不識，後翻碑後有漢字“天祐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”知“天祐民安”乃西夏年號，這一發現不僅使他成為近代確認、辨識西夏文第一人，亦揭開了往後研究、釋讀西夏文字的序幕，使這自明代中葉以後消失的神秘王國文字再現，得以重視研究，不致再被煙滅。西夏官印亦是封建王朝各級機構、官員頒佈政令、行使權力的憑證。西夏用印《天盛改舊新定律令》規定：“諸司行文字時，司印、官印等純金、純銀及銅鍍銀、銅等四種，依司位、官品等，……”可見職官高低不同，其工監印用印有嚴格區別，但根據出土及傳世品實物皆銅質，其餘未見。西夏印分六字印、四字印、二字印。白文有邊框，皆鑄造。橢鈕多有穿孔、間無孔。六字、四字印文以現有實物顯示，多是專印及工監印。二字印除紀年印外，基本是首領印，首領又分大首領、正首領，在印背刻款識別。六字、四字印台較薄、印文淺、打磨精細。二字印一般印文深鑄，較粗簡，可見官級之別。除六字、四字印外一般有刻背款，右刻用印紀年，左刻持印者姓名，鈕頂刻一西夏文“上”字。

西夏朱文官印極罕有，僅見天津藝術博物館藏“有神聖位”及《艾黎捐贈



文物精粹》“乾祐”、“元德二年”印。“元德二年”印中國歷史博物館和吉林省博物館各收藏一方。

羅福頤先生《西夏官印彙考》著錄六字印有4方，據知《青海金石錄》1方，則共有5方；四字印上海博物館1方，故宮博物院1方，《楓園集古印譜》1方，西安市文物管理處1方，日本太田氏2方，北京市文物局1方，貞松堂舊藏1方，天津藝術博物館1方，寧夏固原博物館2方，寧夏私家藏1方，中國歷史博物館2方，吉林省博物館1方，甘肅省山丹縣“艾黎捐贈文物”1方，香港中文大學1方，珍秦齋2方，不詳藏家2方，合計約19方(含紀年四字印)；二字印最多，在《西夏文物》，白濱《西夏官印、錢幣、銅牌考》記錄約111方，最近陝西、吉林、遼寧省等地均有出土及收藏，加上本人、不知名藏家(中央電視台“鑒寶”節目、開元泉社網上亦展示過各一方)及“艾黎捐贈文物”朱文印1方，約160餘方。

本圖錄第34頁“官”字朱文印，乃現今唯一一方西夏烙印，保存完整長鐵柄，柄乃納木之用，“官”字，意為“公家的”。《天盛年改舊定新律令》卷19《牧盈能職事管門》規定每年四月一日至十月一日將四種官有的駝、馬、牛、羊“于盈能處置號印，盈能當面應于仔、駒寄之耳上或羔羊面頰上為號印”即烙印以示作為官畜標記。又《天盛律令》第五章297條“全部從征者應根據其財產狀況繳納戰馬，並需烙印馬，烙印馬必須牙蹄健壯……”可証西夏畜牧業采用烙印來進行管理。文獻只記載烙印位置，至於印記具體文字沒有說明。今“官”字烙印可填補文獻之不足，彌足珍貴。

西夏私印據孫慰祖先生《唐宋元私印押記初論》披露除《西夏官印彙考》所著錄“千”、“監”兩件外，《樂氏藏古璽印選集》、《赫連泉館古印存》各著錄一件，則共四件。最近《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》第一卷披露在B85室出土了一方木質西夏印，字義為“茂”、“盛”，音“嵬”，印章長17.20、寬8.4~10.8、厚1.6~2.4、鈕長6.8寬3.2、高2.8厘米，鈕上有圓穿孔(圖二)，為西夏用印增添一新品種，彌足珍貴。

最近《考古》2002年第4期披露1995年甘肅武威市出土了一件西夏銀質符牌，乃前所未有，以往出土或傳世品皆銅質，這一重要發現無疑給予我們一訊息，說



(圖二)



明西夏官印有銀質與《天盛改舊新定律令》記載相符，地不愛寶，我們期待不久將來得到印証。

忽必烈滅南宋，建立元王朝，官印印文有漢文及八思巴文，如第38頁屬八思巴文官印，經葉其峰先生考訂此印為“忠信義兵百戶印”，以“忠信”為號的軍印罕見，羅福頤先生曾藏一拓本“忠信義兵千戶所彈壓之印”已屬難得的“忠信”軍印拓本，今實物更加可貴。私印存世數量最多，形式及內容豐富，有花押、謹封、頓首、吉語等等，花押實則是個人簽名識別的一種表現。

本篇所收私印以漢為主，其中不乏諸譜罕見之物，如第87頁“王鳳之印”，銅質蛇鈕，蛇的形態與秦官印“浙江都水”近同，印面碩大亦如官印，印台及側尚粘存殘帛。可謂蛇鈕私印之冠，亦稀世之物。據孫慰祖先生《古印中所見的蛇》⁽²⁴⁾考証，此印屬西漢晚期與《漢書》王鳳其人時代吻合。

第88頁“李惲私印”馬鈕，穿孔兩面均殘存帛帶；第104頁“黃柱天印”兔鈕，兩者造型寫實、形態生動逼真，為同類印鈕中未見。

第97頁“家君”，琉璃質，此印包漿色澤艷麗，印文娟秀，堪稱琉璃印極品。此印後經孫慰祖兄審視，謂時代可能較西漢為早，或屬秦。

第95頁“文德之印”銀質，龜背上鑲嵌有圓形瑪瑙五粒，極顯華貴，同類印僅見西安文物管理局文物保護考古所藏銅質“郭慶之印”⁽²⁵⁾，惟此印同出有3件銀質圖形鑲嵌瑪瑙飾件，頂部橢圓形鏤空，用途不明，前所未見，珍罕之極。

第102頁“錯重”，銅質螭虎鈕，螭虎盤踞有力，佔盡印台，極顯威猛，特徵與滿城一號漢墓所出一方未刻印文的螭虎鈕玉印接近，此種螭虎鈕，應是帝后用印鈕式，可見印主非同凡嚮。

第132頁“慶充之印信”此印銅質極佳，印台部份看似鎏金，實原銅泛光，龜背突起，中脊刻回紋，側刻多角形紋，甲邊四周鑿刻圓圈點，頭、爪均有刻紋，刻工精細，特別印文刻鑿嚴謹如金印“漢委奴國王”，確是存世新莽私印不可多得珍品。

第133頁“周弼印信”辟邪鈕套印，此類印章自東漢發展至魏晉，有三套及二套印，辟邪多作昂首嘶鳴狀，此印特異之處在印台四側刻有龍、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，並錯金線，非常精緻，同類印中少見。

第142頁“為善最樂”此印鐵質罕有，同類印文中皆銅質。1987年台北故宮博物院展覽並出版《故宮歷代銅印特展》，將圖錄印3的一方印，據其印鼻鈕



原始，印體略呈長方薄板狀，與晚商銅印形制相近，又因印文奇特，繼而將該印定為周代。王人聰先生在其《毓慶宮舊藏“為善最樂”印年代辨析》⁽²⁶⁾文中除正確將印文考釋斷代為宋印外，更指出此印文的所屬性質文字。

第143頁“直敬堂”牙質龍鈕，據孫慰祖先生考印文書法與元末姚廣孝用印“壽椿堂”同，且龍鈕形態飽滿雄邁，雕刻細膩，為元代齋室印。此印文字清秀，可為後世篆刻家學習元朱文的典範。

以上粗略介紹本篇所藏璽印，由於時間不足及資料搜集倉促，且博物館所藏、私家所收，與時俱進，其中必令本篇有不當、不準之處，深祈學術界、藏家、印林賢達，指正給予修訂。

蕭春源於珍秦齋
二〇〇四·十一·八

- (1) 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86年1期。
- (2) 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專刊之四》1990年1月。
- (3) 《上海博物館集刊》第六期。
- (4) 沈況主編·《中國篆刻全集》黑龍江美術出版社，2000年7月。
- (5) 《孫慰祖論印文稿》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9年1月1版，《可齋論印新稿》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3年3月第1版。
- (6) 孫慰祖·《古封泥集成》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4年11月第1版。
- (7) 《上海博物館集刊》第七期。
- (8) 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99年1期，《古璽印與古文字論集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2000年初版。
- (9) 《博物館研究》1984年第1期。
- (10) 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90年1期。
- (11) 《敬求精舍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》敬求精舍·兩木出版社1995年。
- (12) 《可齋論印新稿》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3年3月第1版。
- (13) 《古璽印通論》紫禁誠出版社，2003年9月第1版；《中國文物報》2003年12月3日。
- (14) 蘇健·《洛陽博物館藏印拾零》，《中原文物》1993年第4期。
- (15) 《考古》1984年10期；《燕園聚珍》北京大學考古系編，文物出版社1992年9月1版。
- (16) 見《蒲江縣戰國土坑墓》，《文物》1985年5期及《珍秦齋藏印—秦印篇》圖355、356，臨時澳門市政局，2000年4月。
- (17) 《揚州館藏文物精華》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9月。
- (18、19) 周其忠·《唐代官印初探》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90年1期。
- (20) 《文物》1990年第10期。
- (21) 《考古與文物》1996年第2期。
- (22) 郭守信·王錦厚主編《遼海印信圖錄》遼海出版社，2000年1月。
- (23) 《文史》2003年1期總62輯。
- (24) 孫慰祖·《孫慰祖論印文稿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。
- (25) 《中國璽印篆刻全集》2·璽印下，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。
- (26) 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94年3期。



